

TYZK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稿

ZHONG GUO GONG CHAN DANG TONG YI ZHAN XIAN SHI GAO



● 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史稿

● 姜华宣 王德夫 主编



● 江西人民出版社

● ZGGCDTYZXSG

中国共产党统战史稿

姜华宣 王德夫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875 字数57万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7—210—00499—8/K·17 定价：11.50元

序

廖盖隆

编写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的工作，是一件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姜华宣和王德夫两位同志主编写成的，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统战史稿》这本书，无论是对于我们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或者是对于我们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学习毛泽东思想，都将是一本有用的参考读物。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仅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组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泛统一战线，都有重大意义，乃至有决定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富有独创性的一项重要经验。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表述过共产党要同其他民主政党、其他工人阶级政党联合的思想，表述过象德国和法国这样农民占人口的多数的国家，工人阶级要联合自己的天然同盟军农民的思想。这就是他们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列宁更表述过俄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要联合全体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要联合贫农和中农，乃至争取同社会革命党和少数派孟什维克联

合的思想，他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特殊的阶级联盟。列宁认为，从原则上讲，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这无论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或者是在以后，都是十分重要的。这说明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的思想。

中国具有与西欧和俄国不同的国情。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发展落后而且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反革命的掌握着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坚决革命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阶级），都是人数很少而且尖锐对立的；而处在中间地位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一个人数很少而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阶级），却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谁取得中间阶级的拥护，谁就能取得胜利。因此争取大多数人，组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败，就是一个在政治上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现在仍然存在并且比过去更加巩固和扩大了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集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统一战线这个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周恩来在1943年作的《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4年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5年作的《论统一战线》等报告，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许多论著中，对于这个理论系统的形成及其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卓越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战线理论系统，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更大理论系统的一个

组成部分。而他提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造成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大同。

毛泽东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1925年10月《答少年中国学会问》和同年12月首次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中，就表述了他后来在1940年1月正式提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要团结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统治。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时说：“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①

毛泽东在1939年总结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经验时，就已经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是：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即以武装斗争为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党的建设问题（即建设一个能够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的问题）。他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

^①《毛泽东选集》，1967年11月横排袖珍合订本，1208页。

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①

他在1949年6月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经验时又说：

“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②

我们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要把握住两个基本点，这就是：一、必须组成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没有这样一个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胜利是不可能的；二、这个统一战线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从上述第一个基本点出发，我们就不但应当对于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采取联合的政策，而且应当对于非劳动人民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也采取联合的政策。从上述第二个基本点出发，我们又必须坚持同资产阶级争夺对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对于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妥协性和动摇性，按照它们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的斗争策略。

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当时领导着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曾经犯了右的和“左”的错误。1927年陈独秀主义对

^{①②}《毛泽东选集》，1967年11月横排袖珍合订本，第576页，第1367页。

资产阶级、国民党采取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方针，放弃了无产阶级对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结果招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三次“左”倾错误领导人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即对于除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采取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错误方针。这种“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当它在各革命根据地得到贯彻执行以后，造成了中国革命事业在1934年的又一次惨重的失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当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潮流日益高涨、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许多官兵纷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的时期，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仍然坚持所谓工农统一战线，以及所谓“下层统一战线”，即对除工农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实行“一切斗争”的孤家寡人策略，更使得中国共产党丧失了领导在全国范围日益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高潮的主动权。

是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呢，还是不要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的策略呢？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毛泽东在1935年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说：“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

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①

应当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于除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实行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政策，是根本上错了的。毛泽东在1948年3月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中说：“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由于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迫害和限制，他们又可以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或者对革命守中立。”

“这个阶级曾经参加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而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他们中间的不少分子，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那个时期我们在政治上不应该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不应该保护他们，就认为我们在那个时期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不是冒险主义的政策。相反地，那时我们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他们，以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②

历史的经验证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和资产阶级、主要是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是错误的，这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是错误的，这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我们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4月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

^{①②}《毛泽东选集》，1967年11月横排袖珍合订本，第137、第141页、第1138页、第1184页。

和跋》中说：“现在，党的政策必须与此不同，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①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同和我们合作抗日、掌握着全国政权和庞大军队的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包括局部性的然而规模相当大的“磨擦”战争在内。国民党在反共反人民的“磨擦”战争中，出动了几十万军队，其中仅在皖南事变一次，就出动了七八千人，设伏围攻和消灭新四军军部9千人（只有两千余人突围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果断地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在斗争时又采取“有理（防御原则）、有利（胜利原则）、有节（休战原则）”的原则。由于我们对国民党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政策，终于粉碎了国民党配合日伪军从背后向人民军队发动的无数次进攻，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到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

不仅如此，当资产阶级破坏统一战线、悍然分裂统一战线叛变革命时，我们还要敢于和善于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1927年，当原来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讲话的蒋

^①《毛泽东选集》，1967年12月横排袖珍合订本，第750页。

介石、汪精卫相继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阵营，实行反共分裂时，由于陈独秀不敢于和不善于对大资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致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遭到了重大损失，生气蓬勃的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①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对日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华民族就不会取得对日抗战的伟大胜利。

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企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下，重演1927年的故伎，再一次把中国人民推入内战的血海。这是确实的。他虽然在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但这只是为了“缓和国际视线”，“拖延时间”，作好内战准备，以便“清剿”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就在国共和平谈判进行时，蒋介石在1945年9月20日给各战区长官的一份密电中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

^①《毛泽东选集》，1967年11月横排袖珍合订本，第937页。

清剿之。”^①

但是，这一次蒋介石完全打错了算盘。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新的反共内战时，不但没有重犯类似1927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例如交出军队，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而是一面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争取和平民主的发展，一面坚决作好了以革命战争去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的准备。中国共产党也没有重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因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破坏了统一战线，就对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采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方针，而是继续高举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旗帜，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阵营分化出来的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去共同进行反对美国侵略中国和扶蒋反共，反对蒋介石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的斗争。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相互关系中，也还是既联合又斗争的，不过斗争的形式主要是进行批评说服、进行政治教育，例如批评他们在和美蒋进行和平谈判时有时受骗上当，批评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有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之间没有发生过“磨擦”战争这样激烈的斗争，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掌握武装力量的原故。

毛泽东在1948年1月18日写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

^①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第3页。

个重要问题》一文中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①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做的，因而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空前的巩固和扩大，从政治上保证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部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实现，就是使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条件。毛泽东早在1937年5月7日所作的全国党代表会议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就说：“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②中国革命的进程，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预言发展的。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终于实现了从大资产阶级占

^①《毛泽东选集》，1967年11月横排袖珍合订本，第1168页。

^②同上第254页。

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的转变，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终于被推翻，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终于充分实现。其结果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在1949年取得了全国政权，成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实现了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周恩来首先提出了和阐明了，在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时期，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将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多党派合作这个重要的理论和方针。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特点》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制度是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但又不完全同于苏联的制度，因为我们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盟的政权。他在1957年4月所作的一个讲话中，又对我国所以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这个特色，而和苏联的一党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同作了科学的分析。周恩来说：“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也曾经想争取同社会革命党合作，同少数派孟什维克合作，甚至想争取资产阶级能够赞成国家资本主义。但是，由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当时正遭到十四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同时又进行着国内战争，俄国资产阶级和其他党派都敌视苏维埃政权，只剩下一个俄国共产党继续把十月革命的胜利坚持下去，因此在苏联就没有完全实现列宁提

出的跟各党派合作的设想。然而，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列宁的设想实现了。”其所以能实现，还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得正确，才“使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①。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发展而来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它的名称仍然叫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过在这时人民民主的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民主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代表它们的民盟、民革、民建、农工党、民进、九三学社、致公党、台盟8个民主党派、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参加了1949年召开的、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从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协。这些阶级和党派的代表人物也参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机关的工作。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全国人大召开以前，重大方针政策都要经过人民政协讨论，然后建议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施行。1954年全国人大召开以后，它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代表人物协商国家大事的机关。这样，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就参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周恩来说：“革命胜利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起了作用的，动员了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参加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进

^①《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348页。

行得比较顺利、比较快。”^①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了国家用和平方式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则逐步改造成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也已经改造成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下的劳动者。原来基本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的各民主党派，这时的阶级性质也改变了。周恩来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民主党派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②。这也就是说，它们都已经成为代表它们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社会主义党派了。

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既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我国是否还需要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泛统一战线和多党派合作呢？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毛泽东在1956年上半年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在1957年2月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谈到这个方针时说：“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

^{①②}《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1页、第438页。

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①

周恩来在1957年4月所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讲话中，对这个方针的正确性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保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泛统一战线和多党派合作的必要性，更作了系统的说明。他说：“既然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能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团结在一起，那么，怎么能够设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继续合作下去呢？”“各民主党派联系群众的方面不同，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意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有利的。”他又说：“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只要还有党派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求大同存小异，这并没有坏处……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②

那么，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多党派合作在社会主义改造（或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周恩来首先明确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包括从经济基础到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上层建筑的全面改革和全面建设的科学观点。他在1953年9月所作《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资本主

^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卷，第394、第395页。

^②《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8页、349页、350页。